

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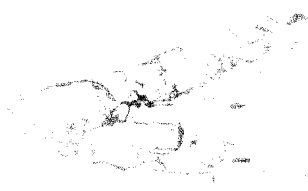
· 第二辑 ·

四川大学古代南方丝绸之路
综合考察课题组 编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1995年·成都



目 录

再论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·····	江玉祥(1)
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(增订稿)·····	江玉祥(42)
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·····	张 毅(64)
古蜀民族南迁略考·····	范 勇(74)
“灵关”与“零关道”·····	刘世旭(83)
论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·····	李绍明(89)
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“摇钱树”探析·····	江玉祥(103)
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食盐贸易·····	张学君(140)
“连枷”的风俗传承与“反”字的得义	
——西南丝绸之路风俗考之一·····	江玉祥(151)
中国地狱“十殿”信仰的起源	
——西南丝绸之路风俗考之二·····	江玉祥(161)
“西南丝绸之路”的初步考察·····	罗二虎(187)
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	
——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··· [印度] Haraprasad Ray 教授	
江玉祥译(263)	
关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证据:	
阿豪马人迁居阿萨姆的路线··· [印度] S. L. Baruah 教授	
江玉祥译(290)	
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·····	梁 州(303)
后 记·····	(310)

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
**STUDIES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
IN SOUTHWEST CHINA**

第二辑 Volume 2

目 录
Contents

MOR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SOUTHWEST
CHINA

* ———Jiang Yuxiang (1)

TOWARDS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SOUTHWEST
CHINA (Revised and enlarged manuscript)

——Jiang Yuxiang (42)

THE SOUTHERN SILK ROAD AND THE MARITIME SILK
ROUTE

——Zhang Yi (64)

A BRIEF EXPLORATION ON THE SOUTHWARD MIGRA-
TION OF THE ANCIENT SHU MINORITY NATIONALITY

——Fan Yong (74)

" LINGGUAN" AND " LINGGUAN ROUTE"

——Liu Shixu (83)

ON THE SILK ROAD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
CORRIDOR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

——Li Shaoming (89)

AN EXPLORATION OF THE " YAOQIANSHU" EXCAVAT-

ED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 SOUTHWEST CHINA

———Jiang Yuxiang (103)

THE SALT TRADE ALONG THE SOUTHERN SILK ROAD

———Zhang Xuejun (140)

THE CUSTOM TRANSMISSION OF " FLAIL "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" FAN " —— A Investigation of the local customs along the Southwest Silk Road

———Jiang Yuxiang (151)

THE ORIGIN OF BELIEF ABOUT THE " THE HALLS " OF THE HELL IN CHINA —— A investgation of the local customs along the Southwest Silk Road

———Jiang Yuxiang (161)

A PRILIMINARY SURVEY OF THE SOUTHWEST SILK ROAD

———Luo Erhu (187)

THE SOUTHERN SILK ROAD FROM CHINA TO INDIA —
— An Approach From India

[INDIA] Prof. Haraprasad Ray (263)

THE INDIAN HISTORICAL EVIDENCE ON THE SOUTHERN SILK ROAD; THE ROUTE OF AHOM MIGRATION TO ASSAM

[INDIA] Prof. S. L. Baruah (290)

A SURVEY OF THE STUDIES ON THE SOUTHWEST SILK ROAD FOR THE PAST DECADE

———Liang Zhou (303)

PASTSCRIPT (310)

再论古代中国西南“丝绸之路”

江玉祥

1990年,笔者发表过一篇题为《古代中国西南“丝绸之路”简论》的论文,同时主编出版过一本《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》论文集。从那时到现在,时间又过去了四年。其间,随着我国西南经济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,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,学术文化界对于古代西南“丝绸之路”的研究形成了热潮,人们对于西南“丝绸之路”的认识不断提高。但是,问题没有完全解决,研究有待于深化。本文针对某些文章提出的疑问,拟再作一番阐发,错误之处,欢迎批评指正。

一、历史的回顾

公元前122年,中国伟大的探险家张骞出使西域回到长安,向汉武帝报告说,他在大夏(今阿富汗北部一带)时看见大夏商人从身毒国(今印度)贩运至该地的两种四川产品,一是邛竹杖,二是蜀布。张骞根据大夏国人的描述,推测身毒国“去蜀不远”。于是张骞建议汉武帝,另辟一条从蜀(四川西部)出发,经身毒,至大夏的通道。他将这条设想的“蜀、身毒国道”(即“西南丝绸之路”)同他曾经走过的西域古道(即“西北丝绸之路”)比较一番,认为:西域古道的缺点一是“险”(道路艰险),二是“羌人恶之”或“为匈奴所得”(行路不安全);蜀、身毒国道的优点是“宜径”(里程短),“又无寇”(安全)^①。从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,

我们至少得到两点印象：第一，在西北丝绸之路开通以前，早就存在一条从四川出发，经印度，至中亚的商道。四川商品，经商人节节转运，已远销至阿富汗。第二，蜀、身毒国道较之西北丝绸之路，里程捷近，又安全。张骞的报告当时确实打动了汉武帝的心，因而才会有后来大规模经略西南之举。

汉武帝经略西南的活动，从建元六年（公元前 135 年）唐蒙使南越归，上书请通夜郎开始，至元封六年（公元前 105 年）汉兵收服昆明夷，设数县，属益州郡为止，历时三十年。其事迹可分两阶段：第一阶段从建元六年（前 135 年）至元朔三年（前 125 年）历时九年。这段时间的主要事迹有两件，一是唐蒙两次（公元前 134 年、前 130 年）征发巴、蜀兵治南夷道，“自犍道指牂柯江”^{〔2〕}。南夷是夜郎的别称。汉犍道城，即今宜宾县治。牂柯江为今北盘江，红水河别名。《水经注》卷三十三“江水注”说，唐蒙“凿石开阁，以通南中，迄于建宁二千余里，山道广丈余，深三四丈，其鑿之迹犹存”。晋代建宁郡的治所，在今天云南曲靖县附近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曰：“秦时常頡略通五尺道，诸此国颇置吏焉。”《史记正义》注引《括地志》说“五尺道在郎州”。唐代郎州治所就在云南曲靖县一带，可见南夷道和秦五尺道的路线是一致的，南夷道并不是唐蒙自己设计的，而只是发现和采用了前人既定的路线，在原有五尺道的基础上进行扩建。南夷道动工的头一年（前 135 年），汉武帝置犍为郡，治犍（今贵州遵义市）。犍，故夜郎国地。南夷道即将修通的时候（前 130 年），犍为郡的治所由犍县迁到南广（今四川省高县、珙县、筠连县，云南省镇雄县一带）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管理南夷道。紧接唐蒙治南夷道的另一件事，是司马相如治西夷道。元光六年（公元前 129 年）“邛、笮之君闻南夷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欲愿为内臣妾，请吏，比南夷。天子问相如，相如曰：‘邛、笮、冉、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时尝通为郡县，至汉兴而罢。今诚复通，为置郡县，愈于南夷。’天子

以为然，乃拜相如为中郎将，建节往使。”“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，邛、笮、冉、駹、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。除边关，关益斥，西至沫、若水，南至牂柯为徼，通零关道，桥孙水以通邛都。”^{〔4〕}零关道在越西县，孙水为喜德县冕山附近的孙水河，邛都即今西昌县。这条经越西县、喜德县，通西昌县的零关道，属古旄牛道的南段。《三国志·蜀书·张嶷传》说，越西郡“有旧道，经旄牛中，至成都，既平且近。”旧道即古旄牛道。汉旄牛县故治在今汉源县清溪乡，从雅安至西昌这一走廊地带，为两汉旄牛族所居，号为“旄牛中”。经过“旄牛中”的道路，故名“旄牛道”。战国时代，它就存在。古蜀国的自由贸易都市，见于文献记载的共有七个，其中有三个分布于旄牛道沿线，分别为：斯都（斯原作徙，今四川天全），笮都（今四川汉源），邛都（今四川西昌）。^{〔5〕}汉兴，“关蜀故徼”，官道不通，私道犹存，“巴蜀民或窃出商贾，取其笮马、犍僮、旄牛，以此巴蜀殷富。”^{〔6〕}司马相如通西夷，拆除边卡，开拓口岸（“除边关，关益斥”），恢复了官道贸易，并整治了旄牛道的南段——零关道，故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称司马相如治西夷道为“复通”。总观汉武帝经略西南第一阶段的事迹，就是恢复和整治了“五尺道”和“旄牛道”两条交通干线，揭开了大规模经略西南的序幕，为寻找“蜀、身毒国道”的使者准备了前进的道路。

尽管“五尺道”和“旄牛道”又恢复了往日的通畅，但汉武帝和他的臣下如唐蒙、司马相如之流，并不知道这是通往印度之路。所以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6年），因公孙弘数言经略西南夷不便，于是汉武帝罢经略西夷，惟设南夷都尉，领二县。直至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因张骞使西域至大夏归，上书请通蜀至身毒国道，汉武帝才又发动第二阶段大规模经略西南的活动。

第二阶段从元狩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至元封六年（公元前105年），历时十七年。这段时间的活动又分前后两段：前段为探

索往印度的通道，后段为打通滇缅道。

先说探道。公元前 122 年，汉武帝从张骞的报告了解到：在四川和印度之间有一条古商道。但是，这条古道的具体路线，当时的汉朝官方并不很清楚。因此，武帝令张骞以蜀郡（治所在成都），犍为郡（治所在南广）为据点，派遣秘密使者“出驪、出冉、出徙、出邛僰”^{〔7〕}分四路探索往印度的通道。“出驪、出冉”这一路秘使，企图经过今阿坝藏族自治州通往印度，结果为此地的氏族部落所阻挡。“出徙（今天全县）”这一路，企图经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，翻越西藏高原通往印度，结果为徙地的笮族部落所阻挡。“出邛（西昌）”这一路，走“西夷道”（古旄牛道），南行渡过金沙江，经云南大姚，至大理地区，结果为嵩族和昆明族部落所阻挡。“出僰（宜宾）”这一路，从犍为郡出发西南行，沿“南夷道”（即秦朝常頌开凿的“五尺道”）前进，至大理地区，同样为嵩族和昆明族部落所阻挡。四路秘使受阻，并未挫折雄材大略的汉武帝“指求身毒国”的决心。元鼎五年（公元前 112 年），汉武帝发兵攻南越，命驰义侯调南夷兵助征。元鼎六年（公元前 111 年），南越破灭，驰义侯诛且兰君，平南夷设牂柯郡。然后移兵征西夷，诛邛君，并杀笮侯，冉驪诸部震恐，设越嵩、沈黎、汶山、武都数郡。设立以上数郡的目的，《汉书·张骞传》曰：“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”（李奇注曰：“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。”），换言之，汉武帝企图将中央王朝有效控制的行政辖区一步步向大夏推进，与其地界相接。同时每年派出十多批使者，由初设郡出发探寻通往印度、大夏的道路，然而“皆复闭昆明，为所杀，夺币物。”^{〔8〕}元封元年（前 110 年），司马迁“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^{〔9〕}。邛，指四川省西昌县。笮，又有大笮、定笮两地。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二曰：“凡言笮者，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‘笮’，其定笮、大笮，皆是近水置笮桥处。”汉之大笮县包括今四川省攀枝花市以北，盐边、米易两县之地。汉之定笮县，今为四

川省盐源县。昆明，今云南省大理地区。万历《云南通志》卷二《大理府·山川》云：“玉案山在叶榆河东，汉元封间，郎中司马迁至此观西洱河（今洱海），司马相如至此上疏闻益州。”两司马是否到过洱海？有人表示怀疑。《左传》隐公五年《疏》曰：“略者，巡行之名也。”既然谓之“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，至少司马迁到了大理的边境。司马迁以郎中（皇帝的宿卫侍从）之职南巡，此行的使命显然就是查办历次使节被阻于昆明的案件，同时他也调查通往印度的道路^[10]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对于这些任务，也作了一番交待。他说：“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（四川的走私商人）或至焉”。当时，司马迁带回的信息使汉朝政府明确了“蜀、身毒国道”的方向。从元狩元年（前122年）至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，经过十一年的努力，汉武帝才找到“蜀、身毒国道”的大致方向。

再说打通滇缅道。司马迁从大理地区带回长安的情报，使汉武帝坚信身毒国就在“昆明之属”以西的地方，他很可能认为那个四川走私商人足迹所至的“乘象国”——滇越，便是张騫所谓“其人民乘象以战，其国临大水”的身毒国。尽管现代历史学家对“滇越”的地理位置有各种猜测^[11]，从今天的眼光看来，当年汉武帝选择昆明族居的大理地区作为“通蜀、身毒国道”的突破口，无疑是正确的。元封二年（前109年），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今云南省曲靖地区的劳浸、靡莫部族，以兵临滇（今滇池地区），滇王出降，置益州郡，治滇池县（今晋宁之晋城、呈贡）。汉代滇池地区的居民称“叟”，与洱海地区称“昆”的居民同属羌语族。扫除了滇王国的障碍，汉兵直指洱海，收服昆明族，置叶榆县（今大理、邓川、洱源、剑川、鹤庆），属益州郡。随后，汉兵打通博南山（今永平县城西四十里之丁当山）；渡过兰沧水（今澜沧江），跨濬溪（今保山河），拓展至哀牢山止。汉武帝在澜沧江外置嶲唐（今

保山)、不韦(今施甸)二县,属益州郡。嵩唐、不韦原属哀牢王国地。哀牢王国虽失两县之地,仍领有哀牢山外大片土地,西汉王朝积极向新置的嵩唐、不韦二县移民,企图巩固前哨阵地,继续向西推进^[12]。博南道的开通,有利于中央王朝与哀牢夷互市,收取珠宝、麋雉之利,但是大大损害了长期垄断过境贸易的昆明族酋长头人的利益。元封六年(前105年),“益州昆明反”^[13],汉武帝特赦京师亡命徒,令其从军,派拔胡将军郭昌率领这支军队去益州郡平息昆明夷的反抗斗争。结果,郭昌“无功,夺印。”^[14]可能汉武帝罢免郭昌后,另外加强了军事力量才将昆明夷镇压下去。因为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十三《汉纪》十五记载,昭帝始元四年(前83年)“西南夷姑缯、叶榆复反”。叶榆,即叶榆县之昆明夷。“复反”,说明是伏而又起。总之,汉武帝在世时,官方的使者终于未能越过哀牢王国到达缅甸。西汉王朝西南方面的国际商路始终没有打通,只能通过西南各部族的中介,与印度商人进行间接贸易。

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(公元69年),“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”^[15],明帝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县,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(不韦、嵩唐、比苏、牂榆、邪龙、云南),合为永昌郡,治不韦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·永昌郡》称哀牢地域广阔,“东西三千里,南北四千六百里”。其疆界大致如方国瑜先生所言,“在澜沧江以西逾怒江至伊洛瓦底江地带,其南当至怒江下游两岸近入海地带”^[16]。如此广袤的土地,均置于东汉政府直属行政机构治理之下,“蜀、身毒国道”的滇缅段完全畅通了。通过哀牢地区,东汉政府同缅甸境内的掸族有了直接往来,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·哀牢夷传》云:“永元六年(公元94年),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,遣使译献犀牛、大象。九年,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,和帝赐金印紫绶,小君长皆加印绶、钱帛。”“永初元年(公元107年),徼外僬侥种夷陆类

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，献象牙、水牛、封牛。永宁元年（公元120年），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，献乐及幻人，能变化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马头。又善跳丸，数乃至千。自言我海西人。海西即大秦也，掸国西南通大秦。明年元会，安帝作乐于庭，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，赐印绶、金银、彩缯各有差也。”“敦忍乙”国，据方国瑜先生考证，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载“夫甘都卢国”，位于上缅甸的太公城，波巴信《缅甸史》中的“顶兑”，当即此国^[17]。波巴信说，缅甸境内最初形成的小国中，“称为‘顶兑’的太公王国建立得最早，它位于伊洛瓦底江河畔，是由中国和罗马通商的商人作为中间休息站而开始发展起来的。”^[18]掸国，其故地，一般认为在今缅甸东北部一带。《后汉书》云：“掸国西南通大秦”。《三国志》卷三十裴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云：“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，又循海而南，与交趾七郡外夷比，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，故永昌出异物。”《魏略》所记与《后汉书》可相参证，确知古罗马（大秦）由海道通缅甸，经云南以达四川直至洛阳的交通状况。

西晋末（公元3世纪末），八王之乱起，中国北方动荡，西北丝绸之路通行困难。此时，利用“蜀、身毒国道”赴印度的行旅增多，不仅有商人，而且有去印度求法的高僧。据唐释义净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·慧轮传》载，室利笈多（'srigupta）王朝时（约在公元3世纪晚期），有二十多名中国僧人，从蜀川犍柯道出发，西行去印度求学。笈多王专门建造了一所支那寺，供他们居住学习。义净自注：“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。”^[19]犍柯，亦作犍柯、犍牂。犍柯道，即汉武帝时唐蒙所治之南夷道（秦“五尺道”），北起今四川宜宾，南抵今云南曲靖。又据〔梁〕释慧皎撰《高僧传》卷七和唐释道宣著《释迦方志》卷下记载，公元5世纪初，有冀州人慧睿在各地游学，经过四川西部，被人抢去卖为牧羊的奴隶。后来有信仰佛教的商人，路过时，发现他是僧侣并通晓佛学，于是用金钱把他赎回。此后他西游各国到达南印度留学，精

通印度语言和佛学，回国后还协助鸠摩罗什从事翻译工作^[20]。据汶江先生统计，上述这些人约占两晋南北朝西行求法人数的五分之一左右^[21]。

唐朝国力强盛，中外交往频繁，陆海商道畅通发达。经滇缅道赴印度及西欧的商人僧侣更多，唐宋人著作中屡有这条线路的记载。如：

(1) 唐释玄奘：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《迦摩缕波国》条说：“此国东，山阜连接，无大国都，境接西南夷，故其人类蛮獠矣。详问土俗可两月行，入蜀西南之境。然山川险阻，瘴气氛沴，毒蛇毒草，为害滋甚。国之东南，野象群暴，故此国中象军特盛。”按：迦摩缕波是东印度的一个大古国，此国在今印度阿萨姆邦西部高哈蒂（Gauhati）及其附近一带。

(2) 唐释慧琳：《一切经音义》卷81《牂牁》注：“检《括地志》及诸地理书、《南方记》等，说此往五天竺（竺）路经（应作“径”）：若从蜀川南出，经余姚（应作“姚州”）、越嶲、不喜（应作“不韦”）、永昌等邑，古号哀牢玉（“玉”与“夷”通），汉朝始慕化，后改身毒国，隋（疑作“随”）王之称也。此国本先祖，毒之种胤也，今并属南蛮。北接互羌，杂居之西，过此蛮界，即入吐蕃国之南界，更度雪山南脚，即入东天竺。东南界迦摩缕波国，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、阿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。此山路与天竺至近，险阻难行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。仍须及时，盛夏热瘴毒虫，不可行履，遇者难以全生。秋多风雨，水泛又不可行。冬虽无毒，积雪沍寒，又难登陟。唯有正、二、三月，乃是过时，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，兼赍买道之货，仗土人引道，展转问津，即必得达也。”按：慧琳所说往五天竺的陆路捷径，应指从成都出发，经汉西夷道（古旄牛道），过西昌，至大理，再沿博南道，从保山（永昌）出境，西行至印度的线路。慧琳所说：入吐蕃国之南界，更度雪山南脚”，应指今上缅甸至阿萨姆之间的山

道。三摩怛吒国 (Samatata), 又写作三摩坦吒, 为东印度古国, 故地在今恒河三角洲一带。呵利鸡罗又写作诃利鸡罗 (Harikela), 此国位置应在东印度之极东界, 或以为在今孟加拉国吉大港附近。耽摩立底国 (Tāmrālipti), 又作耽摩栗底, 多摩梨帝, 其地望据考订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尔县的塔姆鲁克 (Tamluk)。

(3) 唐释义净: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一原注:“从那烂陀东行五百驿, 皆名东裔。乃至尽穷, 有大黑山, 计当土蕃南畔。传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, 便达斯岭。次此南畔, 逼近海涯, 有室利察坦罗国; 次东南有郎迦戍国; 次东有社和钵底国; 次东极至临邑国。并悉极遵三宝, 多有持戒之人。”按: 那烂陀 (Nālandā), 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著名寺院, 故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境内 Rājgir 村 (即旧王舍城) 西北七英里处的巴腊贡 (Baragoan) 村。大黑山, 又作黑山、大岭, 应指今印度与缅甸交界的那加 (Naga) 山脉。室利察坦罗 (Sriksetra) 国, 又作室利差坦罗、室利差怛罗, 故地在今缅甸卑谬 (Prome) 东南数英里的摩萨 (Hmawza), 此处系指以卑谬为都城的骠国。郎迦戍国, 又作狼牙修、狼牙须、楞伽修、凌牙斯、凌牙斯加、龙牙犀角, 在今马来半岛北部。社和钵底国, 又作杜和钵底、杜和罗钵底, 在今泰国的湄南河下游地区。临邑国, 即林邑, 一般认为林邑国即史籍所载的环王国、占婆国或占城国, 其中心地区在今越南的广南——岷港省^[22]。

(4) 唐释道世:《法苑珠林》卷 22:“(西洱河) 其地西北去嵩州二千余里, 问去天竺非远, 往往有至彼者。”按: 西洱河, 即今大理洱海。嵩州, 即今凉山彝族自治州, 故治在越嵩 (今西昌县)。这条路线即汉代的西夷道 (古旄牛道)。

(5) 唐诗人陈羽:《犍为城下夜泊闻夷歌》:“犍为城下样柯路, 空冢滩西贾客舟。此夜可怜江上月, 夷歌铜鼓不胜愁。”按: 唐犍为即今宜宾, 样柯路就是前引“自犍道指牂柯江”的汉南夷道

(犍道、五尺道)。从宜宾，沿牂牁道，经曲靖、昆明、大理、保山，可往印度。陈诗称牂牁路就在城下，说明宜宾是这一路线的起点，商船云集也就不觉为奇了。

(6)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九十九记唐贞观二十二年(648)，
“嵩州都督刘伯英上言：‘松外诸蛮暂降复叛，请出师讨之，以通西洱、天竺之道。’”胡三省注曰：“此即汉武帝欲通之道，而为昆明所蔽者也。嵩州，汉邛都夷之地，武帝开置越嵩郡。后周武帝置严州，唐为嵩州。”

(7)北宋孙光宪：《北梦琐言》云，“先是咸通中，有天竺三藏僧，经过成都，晓五天胡语，通大小乘律论，以北天竺与云南接境，欲假途而还。”

由以上七条资料可以看出：汉代的“蜀、身毒国道”至唐代仍然存在，而且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利用。唐人关于这条古道的了解，更加详明。唐代樊绰撰《蛮书》，称“从石门外出鲁望、昆州至云南”这一条线路（即，秦五尺道，汉南夷道）为“南路”，称“从黎州清溪关出邛部，过会通至云南”这一条线路（即，古旄牛道、汉西夷道）为“北路”。据《蛮书》记载，从成都出发，沿途经双流县，蜀州新津县、临邛、名山县、雅州（今雅安）、荊经、嵩州（今西昌）、会川（今会理），渡金沙江，经弄栋（今大姚）、云南城（今祥云）、龙尾城（今下关）、至阳苴咩城（今大理）。沿途共经五十一个驿站，计二千九百三十四里^[23]。

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二《地理志》戎州开边县注云：从戎州开边县（今四川宜宾县安边镇）出发，取石门路（秦五尺道），至大理的里程，计二千七百三十五里。

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三《地理志》节录唐贞元（785至805）时贾耽所撰之入四夷路程，其六“安南通天竺道”，详载从大理往缅甸、印度的路线里程。文曰：“自羊苴咩城（今大理）西至永昌故郡（今保山）三百里。又西渡怒江，至诸葛亮城（今龙陵）二百

里。又南至乐城（今瑞丽）二百里，又入骠国（今缅甸）境，经万公等八部落，至悉利城（今缅甸抹谷）七百里。又经突旻城（今缅甸蒲甘）至骠国（指骠国都城，今缅甸卑谬）千里。又自骠国（卑谬）西度黑山（今缅甸西部阿拉千山），至东天竺迦摩波国（今印度阿萨姆邦高哈蒂及附近一带）千六百里。又西北渡迦罗都河（即贾木纳河支流 Karatoya）至奔那伐檀那国（今孟加拉国博格拉 Bogra 一带）六百里。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嚧国（今印度东部拉吉马哈尔）四百里。又西至摩揭陀国（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地方）六百里。

一路自诸葛亮城（今龙陵）西去腾充（今腾冲）二百里。又西至弥城（今盏西）百里。又西过山，二百里至丽水城（今打罗）。乃西渡丽水（今伊洛瓦底江）、龙泉水（勐拱河），二百里至安西城（今缅甸孟拱）。乃西渡弥诺江水（今亲敦江），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（其地在今印度曼尼普尔一带，或以为在今阿萨姆北部以西至恒河流域）。又西渡大岭（那加山脉），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箇没卢国（即迦摩缕波国）。又西南千二百里，至中天竺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，与骠国往婆罗门（唐时称印度曰婆罗门）路合。”

根据《新唐书》卷四十三记载，从大理出发，经缅甸往印度的道路（即刘伯英所谓“西洱、天竺之道”）主要有两条：一是从大理出发，经保山、龙陵、瑞丽，进入缅甸，又经抹谷、蒲甘、卑谬，越阿拉千山，至印度阿萨姆，再经孟加拉国博格拉，至印度恒河平原，共计里程五千六百里。二是从大理出发，经保山、龙陵、腾冲、盏西，进入缅甸，又经打罗，过伊洛瓦底江，渡勐拱河，至孟拱，再西渡钦敦江，至阿萨姆北部，翻那加山，至阿萨姆邦高哈蒂，又西南行至孟加拉国博格拉同前一条经缅甸往印度的道路汇合，共计里程三千二百里。

通过以上论述，古代“西南丝绸之路”的走向大致已经清楚。

这条古道的川滇段有两途：一走“古旄牛道”（即，汉“零关道”、“西夷道”，唐“清溪关道”）。从成都出发，经双流、新津、邛崃、名山、雅安、荣经、汉源、越西、喜德、冕宁、西昌，到达会理县境以后，折向西南行，由黎溪的鱼鮓——拉鮓渡口渡过金沙江，经攀枝花市至云南大姚，最后到达大理地区。另一途，从成都出发，沿岷江而下，经彭山、乐山、犍为至宜宾，再沿秦“五尺道”（即，古犍道，汉“南夷道”，隋唐“石门道”、“牂牁道”）南行，经高县、筠连，向西折入横江河谷，经豆沙关、大关、昭通、曲靖而抵昆明地区，再从昆明至大理。从大理、经缅甸、至印度的道路（即，汉“博南道”、“永昌道”、唐“西洱、天竺道”）又有三条：一是从大理出发，沿滇缅公路南行，经保山、龙陵、瑞丽，进入缅甸，又经抹谷、蒲甘、卑谬，越阿拉干山，至印度阿萨姆，再经孟加拉国博格拉，至印度恒河平原。二是从大理出发，经保山、龙陵、腾冲、盏西，进入缅甸，又经打罗，过伊洛瓦底江，渡勐拱河，至孟拱，再西渡钦敦江，至阿萨姆北部，翻那加山，至阿萨姆邦高哈蒂，又西南行至孟加拉国博格拉同前一条经缅甸往印度的道路汇合。三是从大理出发，经保山、腾冲，循大盈江南行，经干崖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（明代叫“江头城”，伊洛瓦底江上游重要口岸，其地位相当于我国的宜宾）。从八莫出发又有水陆二途到印度：陆路从八莫北行，至密支那与第二条路线汇合，经孟拱，至阿萨姆；水路从八莫顺伊洛瓦底江航行出海，经海路到印度，亦即是《魏略·西戎传》记载的从大秦通益州永昌之“水道”。

这里归纳的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几条路线，主要指汉唐史籍中反复出现的，为唐代以后千余年俱遵循的几条主干道。至于群山万壑中，蜿蜒曲折的无数支线，本文均不讨论。

二、认同与歧议

中国古代有一条从成都出发，经云南，越缅甸，通往印度、中亚，直至西欧的商道。即司马迁所谓“蜀、身毒国道”，自汉至唐，史不绝书。中外学者对这条古道，绝大部分取认同态度。

外国学者中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撰《交广印度两道考》一书，认为在纪元2世纪前“中国与印度已由缅甸一道发生贸易关系”。伯希和考证，印度古代梵文经典《摩诃婆罗多》（Mahabharata）和《摩奴法典》（Manou）中“支那（Cina，即中国）一名，乃是“秦”的对音，“印度人开始知道有中国，好象是从这条道路上得来的消息。”^{〔24〕}

英国学者G·E·哈威著《缅甸史》指出，上缅甸“其地固与中国为邻，且自纪元前2世纪以来，中国已以缅甸为商业通道。”这些通道，根据伯希和及亨特两位学者的考证有三条：伊洛瓦底江（Irawaddy）为一道，萨尔温江（Salween）为一道，尚有一道乃循弥诺江（亲敦江，Chindwin）而下，经曼尼坡（Manipur）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（Afghanistan），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换取欧洲黄金^{〔25〕}。

缅甸历史学家波巴信说：“上缅甸约在一千七百年以前，由于它位于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中国互相往来的陆上通衢之间，就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陆上枢纽。”^{〔26〕}

英国李约瑟指出：“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，在四川和印度之间，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。”“从汉代初期起，便有迹象表明，除了布匹和竹杖之外，别的货物也曾通过云南和阿萨密的森林山区。”^{〔27〕}

英国历史学家D·G·E·霍尔说：“从印度前往中国（除海路）还有一条通过阿萨姆、上缅甸和云南的北方路线。历史的记载证明，早在公元前128年，当张骞在大夏发现四川的产物时，这